

文明型国家的魅力*

[美] 胡锦涛 (Alex Hu)

张 依 译

诞生于象牙塔的思想是如何进入权力殿堂的呢？201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科克 (Christopher Coker) 教授出版了一本探讨“文明型国家”的著作，在该书中，科克描述了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秩序将构成威胁的新型意识形态。三年之后，2022 年 4 月 1 日至 3 日，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的四位政策顾问齐聚纽约市的一场会议，主题为“文明型国家和自由帝国——两者终将碰撞？”。会议主办方是研究“当代批评理论”的季刊《泰洛斯》(Telos)，约三十名学者和知识界老手到会，但未能达成多少共识。蓬佩奥的顾问在此话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但他们来参会本身就佐证了科克的观点已经备受关注。

《泰洛斯》杂志创办于 1968 年，它的创始人保罗·皮肯 (Paul Piccone) 梦想着用杂志帮助美国左派阐明激进的政治理论。该杂志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专注于翻译“批判理论”领域内的主要著作，1990 年代新左派销声匿迹后，杂志转而研究颇有争议的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和宗教。2004 年，皮肯去世后，他的遗孀玛丽通过机构订阅和图书销售的方式使杂志得以维持下去。该杂志现在并不单一划分左派和右派，而是聚焦于自由主义滋生的不满，并持续开展相关理论研究。

文明型国家概念之所以引起《泰洛斯》圈子的注意，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权公开蔑视激进分子所描述的“自由帝国”——从自由贸易到人权问题等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对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而言，文明型国家可能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本土的自我主张；而对那些将自由主义与过度自我表达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派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是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文明型国家的理念吸引了各种非自由主义者。2019 年，《泰洛斯》会议的组织者兼杂志副主编阿德里安·帕布斯特 (Adrian Pabst) 发表了一篇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文章，同时展现了上述的左右两派观点。在该文中，帕布斯特斥责“自由资本主义”树立了“美化贪婪、性和暴力的文化标准”，他还声称，“极端自由主义”正在摧毁西方的“希腊-罗马哲学与法律的宝贵遗产……犹太-基督教宗教和伦理”以及世界其他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帕布斯特也并不看好俄罗斯和中国，因为他认为，这些国家自上而下控制的模式同样具有破坏性，但他仍然充分理解中俄对全球无根性的反抗。

根据帕布斯特和科克的说法，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通过声称本国代表着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道德世界，试图使其行为合法化。自 2012 年以来，普京一直主张俄罗斯文明是一种“由

* 摘译自 Alex Hu, “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May 5, 2022),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llure-civilizational-state-202230>, retrieved May 20, 2022.

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国家文明”。同时，习近平也多次表示，要致力建设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明。

无论如何，他们的言辞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这种感觉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初，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想者就认为，当特定的社会文化能够表达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时，人类将会得到最好的发展。今天，像以色列哲学家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这样的民族民粹主义者正在试图通过政治理论使类似的想法复苏。然而，民粹主义者的粗糙言论通常引起太多人的反感，人们总会不禁想起那些毫无意义的战争和暴力历史。

相较之下，文明型国家既抓住了同样的感觉，又能免于背负历史包袱。那些使用“文明”话语的人大可以借助“文化多元化”来立论，同时回避领土、种族和战争等问题。倘若被问及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发表于《外交事务》的里程碑式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文明是否会发生冲突？人们也许会回答，这只是由囿于自己道德世界的个别国家引起的，这些国家并不能组建足以撼动世界的大同盟（尽管正如我们所见，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文明型国家的叙事是否有政治前途呢？它们能否在大众想象中留下痕迹并最终影响政治决策呢？这些就是《泰洛斯》圈子想探索的问题。《泰洛斯》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斥着一种自负的气氛。会前一个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在一篇关于普京和乌克兰战争的专栏文章中把俄罗斯称为文明型国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最主流的媒体报道，此前这个概念曾引起《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的关注。直至葡萄牙欧洲事务部前部长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2013—2015年在任）将文明型国家概念纳入他广为流传的关于欧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政治理论后，这一术语开始流行。

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马塞斯一直是自由普遍主义的批判者。2020年，凭借著作《历史已经开始》的面世，马塞斯进入了美国主流评论界。在过去一年的国家内乱和以推特为主要媒介的全民反思中，马塞斯凭借其掺杂着对美国不满情绪的挑衅性判断，迅速在智囊团和播客圈中崭露头角。2020年12月，杜萨特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主持关于马塞斯的讨论之前，《华尔街日报》已经对马塞斯的著作做出积极评价。

2021年之前，文明型国家已不再仅仅是边缘想法。到了2022年，这些观点已呈现在《纽约时报》中。马塞斯的预言比科克的预言要黑暗许多，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西方”已然消亡，他写道：美国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它将后现代的“非现实原则”作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予以捍卫——（在此种文明中）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作“普世”真理强加给别人。马塞斯认为，目前只有欧洲仍然秉持着客观真理，保留着真正的现代性和自由；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的美国既藐视国际规范，也藐视事实本身。^①

根据马塞斯的思路，他可以用与民粹主义者相同的情感诉求来论证欧洲一体化，把它描述

^① 参见 Bruno Maçães, *History Has Begu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建设（过程）。如果国家主权的概念是欧洲文明所独有的，而非欧洲的文明型国家正在崛起，那么欧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捍卫其国家主权的传统。马塞斯将自由民族主义重塑为一个独特的欧洲模式，而不再是“普世”模式。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做法。

只是还有一个大问题。

尽管马塞斯对欧洲持乐观态度，但文明型国家的建设项目对世界各地的小国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马塞斯认为，让各文明型国家之间（包括强化的欧盟）保持力量平衡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多元世界秩序。然而，这样一个世界，用马塞斯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个大国“吸收（他们的）邻国”的世界，因为“国家负有在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地区内保卫特定文化传统的首要责任”。这就解释了杜萨特为何将俄罗斯称为文明型国家。

如果在一个世界中，大国理所当然地将道德妥协视为对其“文明”的既有威胁，国际规范还能够存续吗？

如果世界领导人真心想创造一个马塞斯或普京所述的未来——那么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倘若这些想法更广泛地流行起来，政治领导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已被对这些想法信以为真的公众所困。

在《泰洛斯》会议上，曾与蓬佩奥共事的四位政府官员探讨了文明型国家发展的若干可能性。他们在任期间对“文明”的说辞并不陌生，2017年以来，那些试图制定“特朗普主义”的记者就一再提出“文明冲突”的世界观。会议讨论显示，这些说法虽然可能是错误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一些政府助手甚至可能早在2019年就开始考虑文明型国家的问题。

曾在天赋权利委员会供职的大卫·潘（David Pan）和曾担任政策规划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拉塞尔·伯曼（Russell Berman）碰巧也分别是《泰洛斯》的编辑和荣休编辑，他们在政府工作时经常要处理具体的世界秩序等问题。两位和《泰洛斯》创始人保罗·皮肯私交颇深，且已在该杂志工作了几十年。在副主编阿德里安·帕布斯特于2019年秋季发表相关文章时，潘和伯曼可能早已经注意到了“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

但《泰洛斯》会议的主要影响集中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2018年8月至2019年在任）和时任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余茂春（Miles Yu）身上，两人在会议主题上产生了强烈分歧。斯金纳在任时曾经公开发表言论，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描述为“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斗争”，并将中国形容为美国“第一个来自非高加索文明的强大竞争对手”，此言一出，随即招致骂声不断。斯金纳于2019年被解雇，而余茂春则升职为蓬佩奥的高级政策顾问。

这两人的意见很重要，因为思想在政策规划者的手中可以变成真正的权力。

这些政策幕僚直接面向国务卿，就全球战略事宜建言献策，他们还需极力确保执行政策的六个地区局不会使地区优先考虑与宏观的蓝图相冲突。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任职者则横跨学术界、智库和政府机构等进行工作，历史上著名的政策规划者包括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余茂春坚持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文明冲突”，而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余茂春还暗示蓬佩奥和他意见一致。相比之下，他认为关于文明的谈论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什么实际操作价值。

斯金纳并不同意，但这也似乎证实了她的想法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小组讨论中，斯金

纳谈道：她在任时曾经尝试实施一项认可文明差异的战略，但并未澄清这一战略在实际政策制定中有何指导意义，而只是说，她的想法未能取得很大进展，因为在地区局遇到了过多阻力（而余茂春表示他和蓬佩奥完全能够让地区局和政策规划办公室保持步调一致）。这让人们相当好奇国务院当时的这些内部斗争是什么样子的。

会议没有就文明型国家的议题或其他论题达成满意共识，也未能给出任何明确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明型国家”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

最好的情况是，“文明型国家”的想法只是一时风尚；而最坏的情况是，这些思想已经开始推动战略决策。《泰洛斯》杂志也向两位“文明型国家”理念的真正倡导者/提出者——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和中国学者张维为发出了邀请，但他们都没有接受。卢金无法乘坐离开俄罗斯的航班，自由主义帝国“已经开始了反击”。

作者系耶鲁大学青年学人

译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助理